



人文视域下的文学景观

曹

斌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1206.7
375

陕西省教育厅2006年科学研究计划「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人关怀研究」资助
宝鸡文理学院2006年院级重点科研项目「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人关怀研究」资助

人文视域下的文学景观

曹斌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视域下的文学景观/曹斌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12

ISBN7-5034-1607-6

I. 人… II. 曹… III. 文论—中国—当代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1769号

人文视域下的文学景观

著者:曹 斌

责任编辑:肖 洁

装帧设计:彩虹工作室

社址:北京太平桥23号

邮编:100811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00千字

印张:10.5印张

印数:1—1000册

版次:2007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034-1607-6

定价:25.00元

目 录

中国小说民间精神管窥·····	(1)
启蒙话语的退场与新世纪农村小说的走向·····	(9)
鲁迅与现代人格构建·····	(13)
论民间风俗礼仪对人际关系的调控·····	(20)
小说积极修辞的理论倡导·····	(29)
守望儿童的精神世界·····	(35)
童心童趣的诗意开掘·····	(46)
李凤杰的文学创作·····	(56)
颓败的乡土的回望·····	(78)
实·虚·玄·····	(87)
直面现实的写作·····	(97)
农村现实的深度描写·····	(104)
红柯小说论·····	(118)
红柯小说的生命内核·····	(132)
民间视野下的新时期“创业史”·····	(141)
变革的时代 躁动的心灵·····	(151)
愤激的呐喊·····	(156)
民间的关注与书写·····	(166)

论路遥的成长关怀·····	(176)
崇高的失落·····	(185)
《大校》的文化蕴含·····	(191)
“心灵写作”与小说的“可信性”·····	(201)
政治婚姻的透视与人性魅力的张扬·····	(213)
悠扬的笛声·····	(226)
简论王宜振的散文诗·····	(232)
真诚的守望者·····	(235)
“手记”散文的文学意义·····	(239)
直面生活的写作·····	(244)
对人生的诗意叩问·····	(251)
后记·····	(258)

中国小说民间精神管窥

近几年来,谈论小说民间性问题的话语渐渐热烈了起来。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表现了小说理论和批评界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小说理论和批评趋向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种反拨。反映了小说理论和批评在寻求小说阐释新理论的积极尝试,反映了小说理论和批评向中国传统的回归。在文学界不断有人发出关于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已经瓦解,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①惊呼的情况下,谈论小说民间性问题也是面对文学理论困境积极寻找理论突破口的一种努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小说的理论批评上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一种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理论的推崇;一种是向传统小说理论的回归。小说民间性话语的提起,实际上是对多年来被边缘化的传统小说理论的重新确认。这种重新确认,带来了小说批评的新生面,也必将影响小说创作向重视民间性的审美方向发展。

小说的民间性问题的核心是表现于小说中的民间精神问题。对中国小说而言,民间精神是与中国小说相伴而生的,是决

①石一宁.为文学理论“难题”寻新解[N].文艺报,2004-12-07.

定小说审美情趣、表现方式主要因素。小说的民间精神,是小说家的民间立场和视角、民间的价值标准和民间的审美趣味在小说中的综合体现。中国小说是从民间产生的,从它产生直到1902年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它一直处于文学的主流之外,是民众和落第文人借以表达对人生理解的一种方式。作者的民间地位,决定了小说对民间精神的表达。从中国的神话传说到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中国小说一直是被看作“街谈巷说”^①“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②的“闲书”^③而流传于市井百姓之中。而它的经久不息的生命力也正是在于它所代表的民间精神。它所彰显的娱乐功能及故事化生活的叙写方法及表达的民间情感和意愿,都是它被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根本原因。

从“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虽然被抬到文学正宗的地位。但由于倡导者自身的边缘化,仍然不能改变小说民间精神的本质特征。利用小说启蒙,实际上仍是民间对庙堂的说话,而以后的革命文学中,小说仍以被压迫民间的立场对压迫者表达不满和反抗的意愿,小说对底层社会的书写,在客观上保证了它的民间精神的色彩不褪色,赵树理、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当代作家的小说虽然面临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但都体现出坚守民间精神的倾向。

中国小说民间精神的内涵,但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世俗生活的书写,对生命意识的肯定;二是对民间道德的张扬,对正义、真情、侠义、自我牺牲精神的肯定,对奸邪暴虐的鞭挞;三是民间审美情趣和审美形式的创造。

^{①②③}鲁迅,鲁迅全集: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27),(P5),(P60)

中国小说由于作者的民间性和所反映的内容生活的底层性,使它从一开始就表达出对人生的关注,对民间生存样态的关注,对积极生存态度的肯定。王国维在总结小说创作的原委时说,小说创作源于人生之欲而带来的苦痛,“欲之为无性无厌”且“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痛苦感亦弥甚”。而“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①在他看来,小说家面对人生的忧患和劳苦,不是消极地坐以待毙,绝望迫观,而应直面苦痛,走入忧患,导人解脱。这一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生忧患与生俱来的认识是一致的。作为民间精神的代言人,小说家写的是民间世俗的生活,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民间生活总是与苦难相连的。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的“民间总是处在被压迫、被蔑视的状态,国家的权力意志经常强加于民间,使民间原有的秩序被改变”。^②于是,生存的不易成为小说普遍的主题,无论是唐传奇还是后来产生的“三言”、“二拍”、《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及现当代鲁迅、老舍、张爱玲、沈从文、陈忠实小说等都把展示民间的生存状态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唐传奇对官僚、地主、文人、士子、豪侠、商贾、手工业者、以及僧道、歌妓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人物的奇闻趣事的描写,体现了在审美上人情化、大众化的趋向,由于作者大都是出于中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现实和底层人民的生活比较熟悉,所以更能从民间的立场和视角展示客观生活情象,即使对民间口头传奇的加工,也脱离不了他们所秉持的世

①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②陈思和. 骆驼祥子: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J].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04, (11)(P59).

俗立场,大量的个人传奇及这些作品这体现的爱情、历史、政治、伦理、梦幻、英雄、神仙、命运、报应等多样的主题也与唐代诗人惯带的个人主观视角出发感受世界和表达世界的基本态度不同,呈现出客观展示的特征。而普通人物更是传奇的主角,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则是关注的重心。

明清时代,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时期,但小说对民间生活书写的传统没有改变,无论是久试不中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是家道败落“无才补天”的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以民间的疾苦为小说中的重要内容。晚清的社会小说、谴责小说对世情人生的描绘,也大都从关注民间生存状态的基点出发,揭露鞭撻官场的黑暗、腐败,可以说“哀民生之多艰”,是中国小说民间精神深厚源长的传统。

小说的民间精神,从作家所持的写作立场上看,自然与站在庙堂上讲话的宏大叙事的写作立场不同,主要表现为不为统治阶级评功摆好、涂脂抹粉;不受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影响;不受统治阶级历史观的支配,而以民间的生态观、发展观、是非观来评价人间是非曲直。也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用知识分子的审美标准来书写生活和评价事理及人物的行为。而是从民间生存不易的世情出发,张扬民间的道德,表达对真情、正义、和平、侠义、自我牺牲精神的赞扬。

可以说,从人类有了阶级以来,生存于民间的百姓就变成被剥削、压迫、欺凌的对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出了这种宿命的情况。苦是苦,但作为生命都是无法停息下来的,于是,期求平和、富裕的生活就成了民间对生活的向往;书写弱者对正义、和平、侠义、自我牺牲精神的期盼就成了小说民间精神的追求。当代作家中宣布自己“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莫言在解释民间写作

时说,“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真民间”和“伪民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民间精神上。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檀香刑》就是站在民间立场透视历史、解构、颠覆正史,控诉当代某些政府官员为霸一方,草菅人命罪行的。

在民间精神关照下的小说,官与民总是对立的,民总是被欺侮的对象。古典小说中的民是被官府、衙吏使行暴虐的对象,在现代小说中,民仍是被官员敲诈勒索、实施暴虐的对象。在这种现实面前,呼唤正义、和平、侠义就成为民间对官府失望之后,渴望有民间正义力量拯救百姓的一种选择。这种渴望有时是对群聚山林,不受官府管辖的反抗行为的书写,如《水浒传》;有时是孤魂厉鬼打报人间不平的书写,如《聊斋志异》和唐传奇中《柳毅传》、《王知古》等等;有时则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书写官场、人间丑恶,如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有时则是寄希望于清官出来主持正义;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中国侠义小说的流行和繁荣,是民间希望有别于贪官污吏的清正廉洁的官员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民间义士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倾听他们的祈求,替他们申冤报仇。民众也能从阅读这些侠义小说中获得精神的慰藉,增强他们生活的勇气。

对真情的讴歌也是中国小说民间精神的一大内涵,情是文学之根,特别两性之间的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小说中书写男女之情,表现民间的爱情观、妇女观、贞节观是不可以回避的问题。民间对爱情的书写,总是以突现真情为关注点,在金钱、物质、地位与爱情的关系上褒扬真情的崇高感。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明代的《三言二拍》中的《莽儿郎惊散

新莺丝,绉梅香认合玉蟾蜍》《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清代的《红楼梦》等都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提出了质疑,赞扬了不求富贵,追求自主婚姻,渴望真正爱情的思想。

侠义小说是中国小说重要的一脉,从战国时代,中国就出现了“侠”这一特殊群体。《庄子》《左传》《战国策》《史记》都有对义侠故事和人物的描写。唐传奇中发展了这一传统,不但写男侠,还有了女侠,如《贾人妻》《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崔慎思》《荆十三娘》等,明代清代的义侠小说更是兴盛:《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几乎家喻户晓。当代的古龙、梁羽生、金庸又将中国义侠小说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于出了“金庸热”、“金庸迷”。

侠义小说在中国的风行不衰的根本原因是它内在旺盛的民间精神,即对“义”“气”这种以牺牲自我而扶弱抗强、匡扶正义的人格精神的推崇。中国的民众,自古以来是弱者,是被欺侮的对象,他们渴望有人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他们受到伤害时,能得到“以武犯禁”的侠士的帮助。茅盾先生说过“侠客是英雄,这就暗着小市民要解除痛苦,这须仰仗不出世的英雄,而不是他自己的力量”。^①因为分散的弱小的民众无法与强大的对手相抗衡,只能以对英雄的膜拜来获得感情的满足。

现代作家中老舍先生的《老张的哲学》《离婚》中也通过富有义侠精神的人物来化解矛盾,惩恶扬善。《红旗飘》在对朱老巩和朱老忠两代人的书写中,也都体现出“自古英雄出燕赵”,“为朋

^①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A]. 芮和师,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册[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友两肋插刀”的侠义精神，只不过朱老忠将个人的反抗升华为群体的有鲜明政治目的反抗，但其精神实质还是一样的：即依靠民众的力量实现改朝换代的政治理想。陈忠实的《白鹿原》对现代史的阐释用“翻整子”来比喻，也是站在民间立场对正史的解构。《白鹿原》对“义”的阐释则更多从民间对儒家文化中积极一面继承上来进行的。白嘉轩在民间的视角上就成了“仁义”的代表，他对长工“仁义”的行为也就获得了民间的肯定，这是“义侠”行为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小说民间精神的第三个内涵是对民间审美形式和审美情趣的营造。神话性、通俗性、传奇性可以说是中国小说民间精神在审美上的三大特征。

中国小说的直接渊源是古代神话。神话是“古代文化幼稚的人民用想象的神思去把自己不理解的自然人格化的结果”（鲁迅）。神话的“幻想”性体现了艺术创作的精神。它人神、人兽一体的形象建构及非凡超人的能力对原始人有着精神慰藉的作用。从《山海经》《搜神记》《西游记》《聊斋志异》，我们可以看到神话对小说的源远流长的影响。神话中流露出来的沉重感、压抑感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充满神奇幻想和神鬼、宗教的神秘感都对小说创作起到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段，《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等人的描写，《水浒传》中“洪太守误走妖魔”，《红楼梦》中的女娲补天遗下顽石，《白鹿原》中的白鹿传说和田小娥死后变蝶和飞蛾都无不留有神话色彩，这种神话色彩增加了小说审美中的神秘性。

中国小说民间精神在小说审美形式上的传奇性特征，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故事型小说的心理需求。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审

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建构关系；读者与作品之间也是特定作品拥有特定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中国的接受群体长期受故事型作品的熏陶，因此，乐于接受具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和波澜起伏的情节以及大团圆的结局。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古典长篇白话小说，都以故事性见长，而其中的武侠小说则更是故事引人入胜，情节跌宕起伏。现代武侠小说，秉承这一传统，将故事性小说又去旧添新，让它更适合于现代人的审美需要。

1902年开始的“小说界革命”，引进西方小说艺术，也并没有使故事型、传奇型小说在中国被冷落。现代小说仍然主要以故事来吸引读者，鲁迅《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及当代的《创业史》《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战争题材小说也都以故事性来吸引读者。

通俗性是中国小说民间精神在审美上第三个特征。中国小说从诞生起便有俗文学的深深印记。俗体现在小说的娱乐功能上。既是为了娱乐的需求，小说就要讲故事，除了讲历史故事、爱情故事、神魔故事、“义侠”故事，还讲一些“俗”的故事，如涉“性”的故事，《金瓶梅》《三言二拍》就写了纵欲故事。对人性中“性欲”的书写，是民间对封建禁欲主义的一种反拨。这种现象发展到后来就是清末明初的鸳鸯蝴蝶派的产生和张恨水言情小说及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的出现。涉性、涉爱情与涉武侠是小说通俗性的显著特征。这种通俗性在现代、当代小说中一个时期被当作“媚俗”而受到批判、禁止。但从审美心理上，似乎愈是“俗”的东西，愈能刺激读者的审美情绪，因此，俗文学就以娱乐性而得以不断繁衍。

（原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启蒙话语的退场与新世纪农村小说的走向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显著的变化是启蒙话语的退场。五四以来,为新文学所关注的启蒙主题,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代而起之的是“纯文学”和“俗文学”话语成为文学话语的中心。农村题材小说,这个从鲁迅开始一直作为启蒙话语载体的文学样式,已蜕去了启蒙的内蕴,仅仅成为当代知识分子表现自己“民间立场”和体恤贫弱的话语工具,作为启蒙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现代知识分子“救他”与“自救”主题已经弥散,这不能不是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上最大的缺憾。

农村题材小说与五四开始的中国人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着重关注了两类人物:一类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另一类是以阿 Q 等农民为代表的启蒙对象。鲁迅在关注中国农民精神改造的同时,关注了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保持“先锋性”“韧性”战斗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鲁迅以“立人”为目标,考察了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下的中国农民与现代人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的保守迷信与愚昧上的。现代人具有的科学精神、个性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农民几乎是无缘的。文学启蒙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他的作品让读者看到中国人精神上的痼疾,从而生出改革的意愿。

鲁迅农村题材小说中所寄予的这种启蒙思想,在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家许钦文、叶紫、台静农、许杰等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体现,在萧红、赵树理等小说家的作品里得到进一步的延续。他们的小说都沿着启蒙的思路,刻意表现乡间的死生,乡间文化习俗的鄙陋、迷信造成的愚昧,呼唤科学,呼唤新人格、新风俗、新个性的确立。但是,应该清醒的看到,随着20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启蒙的话语就只能在表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挟带在其中进行描写,如萧红的《生死场》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为单一的农村题材启蒙小说已经处于边缘化了。

建国以后的农村题材小说,由于受制于政治的影响,原有的启蒙思想被减削为对农民自发倾向的改造和批判。在大量的以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为内容的农民题材小说中,农民被化分为紧跟党的方针政策的积极分子梁生宝(《创业史》)、王金生(《三里湾》)、刘雨生(《山乡巨变》);动摇不定的中间人物如梁三老汉(《创业史》)、陈先晋(《山乡巨变》)、亭面糊(《三乡巨变》);新生的党内自发势力的代表郭振山(《创业史》)、范登高(《三里湾》);落后分子或反动分子姚士杰、郭世富(《创业史》)、糊涂涂、常有理(《三里湾》)、龚子元、王菊生(《三乡巨变》)等,农民思想中的个性主义被政治力量强行改造为集体主义,个人的幸福、理想只有在为集体的事业中才被看成有价值的。随着阶级斗争理论扩大化,60、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在叙写改造农民的私有心理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两个阶级斗争的内容,使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启蒙精神踪迹全无。

应该说,在建国后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很少能看到启蒙意义上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虽不乏对农民迷信、愚昧、

落后的批评、暴露和揶揄，但它们的出发点是以农民对党的政策的服从为标准的。对农民的小生产者的私有心理的改造虽然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但超越了农民当时的思想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所谓改造也只能造成农民的口服心不服的结果。它既不能“防修反修”，也不能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反而因为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导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进入文学新时期后，在“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时期，高晓声以他的农村题材小说接续了对农民启蒙的话题。陕西作家贾平凹、路遥在改革小说的背景下，探讨了面对改革大潮，传统文化对农民精神的禁锢作用，但这些小说还是在政治——文化的思维格局中看待农民问题，与启蒙话语还有一定距离。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主导时期的到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发生着急骤的改变，农民在经历了80年代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又变成了边缘化的群体，沉重的赋税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他们成了“打工”的一族。土地成了他们又爱又恨，舍之不忍，种之无利的沉重包袱，而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活又常常被欺凌，被欺骗，劳而无获。

9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没有遗忘农民，新写实主义把农民在这一时期的苦难，把农村在这一时期的蜕变作了有史学意义的叙写，贾平凹的《秦腔》、冯积岐的《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杨争光的《从两个蛋说起》、杨朵的《起风季节》等小说，都在较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叙述了农民的无奈、无助以及传统文化带给他们的精神上的重负。

但是，我对这些小说不满意的是，他们还缺少启蒙文学所应具有的思想深度，他们笔下的农民，大多数还是政治视角上的农民。这些农民的命运也多数是与政治相关的，而从精神上去发掘

农民心理,透视造成农民问题深层的文化原因和个性原因,还远远不够。同时,就作者创作态度看,以启蒙的积极的参与意识去观察和写农民问题的意识还不强。我十分赞赏作家冯积歧这样表白:“我们没有理由打出旗帜为了穷人而写作。但是我们有理由关注在不很温情的环境中生活的普通人,有理由把我们身上的疤痕亮出来让大家看个明白,以便于治疗,有理由为我们的某些缺陷而责备、痛苦及至羞耻。这是需要勇气的。一个好的作家描写的不是人的内分泌,而是人的灵魂,这是大师的启示。”(冯积歧《小说三十篇·自序》)。但我看绝大多数作家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新世纪农村题材小说的走向应该是:恢复鲁迅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启蒙精神。小说作家应在关注农民生存状态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农民的精神状态,在关注农民的精神成长中有所作为。应在对包括自我在内的精神批判与社会批判中深入发掘造成农民精神痼疾和生活贫困的原因,在“救赎”农民中“救赎”自我,完成五四以来尚未完成的民族精神改造的任务。我们应该多一些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多一些聂赫留多夫那样的救赎自我、救赎他人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新世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应该是有科学意识,有理性自觉,有民主思想,有个性特征,有人道情怀的新农民。新世纪农村题材小说不应是对农民的政治关怀,生活关怀,更重要的应是人性关怀,精神关怀,文化关怀。农村题材小说在书写这些关怀中,——农村题材创作:道路依然广阔。

(原载《延河》2006年7期)